

《公益时报》 对话高官谈公益

企业家参与公益事业，能贡献大量的资金和智慧；明星参与公益事业，能够取得更好的社会效应；政治家参与公益事业，不仅能动员更多的企业捐款，还能为国家公益事业的整体发展和完善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刘京 主编



中国出版社



贵财图

1248436

2001-2011
系列丛书

F299.24

36

F299.24
36

2001—2011 公益十年系列丛书

《公益时报》对话高官谈公益

刘 京 主编



贵财图 124843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益时报》对话高官谈公益/刘京主编. --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1. 6
(2001 ~ 2011 公益十年系列丛书)

ISBN 978 - 7 - 5087 - 3583 - 2

I. ①公… II. ①刘… III. ①公用事业—中国 IV. ①F299. 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4659 号

书 名:《公益时报》对话高官谈公益

主 编:刘 京

责任编辑:杨建萍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电话:编辑部:(010) 66088776

邮购部:(010) 66060275

销售部:(010) 66080300 传真:(010) 66051713

(010) 66051698 传真:(010) 66080880

(010) 66080360 (010) 66063678

网 址:www. shcbs. com. 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170mm × 240mm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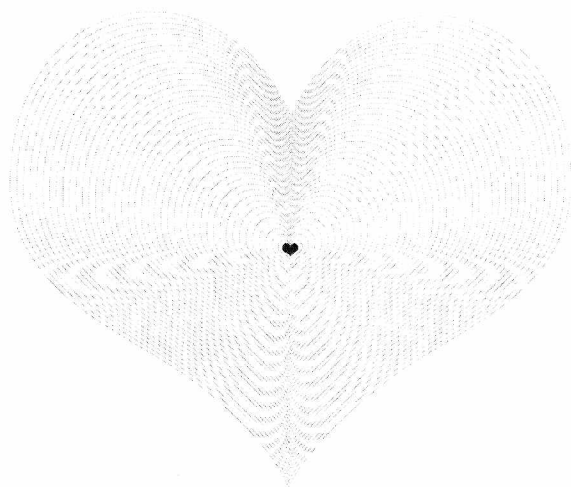
印 张:8. 25

字 数:12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5. 00 元



中国政治人物在 公益中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由政治人物主导的公益活动长期以来占据着重要地位。虽然很多离退休的政治人物在基金会中内并没有具体主持工作，但他们所带来的强大号召力不容忽视。

企业家参与公益事业，能贡献大量的资金和智慧；明星参与公益事业，能够取得更好的社会效应；政治家参与公益事业，不仅能动员更多的企业捐款，还能为国家公益事业的整体发展和完善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这一点，在西方国家同样屡见不鲜，他们或许不是公益事业比重最大的一部分，但一定是很突出的个体。

此前，《公益时报》曾组织随机对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中国健康快车基金会、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国宋庆龄基

金会、中国绿化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国农业科教基金会、中国禁毒基金会、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等 20 家基金会进行调查，内容包括 20 家公益基金会拥有离退休高官的人数、离退休高官所担任的职务、是否全职参与基金会的工作等。

统计结果显示，20 家基金会共拥有离退休高级官员总计达 72 人。平均每家基金会拥有副部级以上离退休高官 3.6 人。其中，仅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 4 家机构没有离退休高官在其中任职。

最多的机构当属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拥有副部级以上离退休高官 14 人，紧随其后的是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拥有退休高官 11 人。在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中国绿化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最新的理事会名单中至少有 8 名退休高官，共同名列第三。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国农业科教基金会、中国禁毒基金会、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拥有离退休高官则相对较少。

进入基金会的离退休高官担任的职务有两类，一类是名誉，即名誉类职务，包括名誉主席、名誉会长、名誉理事长、名誉理事、顾问等，担任虚职的有 25 位，占总人数 35.7%；另一类是实职，从主席、副主席、理事长、副理事长、会长、副会长到理事等各种职务，这部分人数达 45 位，占总人数 64.3%。

例如，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名誉主席为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以及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珏云；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名誉会长分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姜春云、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光英、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曹志；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名誉理事长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等人，他们所担任的职务都是名誉性质的，并不全职参与基金会的日常工作。

而像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他们全职参与基金会

的日常工作，是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并日渐成为基金会的核心和灵魂人物。

众所周知，“希望工程”就是在共青团中央和邓小平的支持下建立的，从“希望工程”设立开始，公益慈善的概念慢慢被很多人接受。不光企业家、明星开始组织参与慈善活动，很多公益组织都是由在任或退休的政治人物任职牵头的。

离退休政治人物对基金会的贡献，更多时候，他们个人的声望和政治素养对机构长远发展是一笔财富。如果没有这些领导的亲和力、公信力和个人魅力，单凭基金会，同样做一件事情，可能就做不成，至少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才能得到社会的信任和支持。

邓小平、李鹏、李瑞环等中央领导人在位和离任之后都十分热衷于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而且他们的影响也波及到子孙后代，形成了一种几代人共有的慈善传统。

在信任危机普遍存在的当今，民间组织很难得到社会承认。如果有离退休政治人物参与，无形中能让机构在筹资、服务、自律和协调矛盾方面发挥独特的优势。当然，也有反对方的意见提出，认为高官的威望容易使民间机构缺乏民主成为“二政府”。从长远来看，过度依赖官员资源，会给机构留下行政依附性强、惰性强的后遗症，这些都不利于民间组织的独立发展。

过去十年中，《公益时报》通过不同的形式对话、采访、报道了数十位活跃在公益一线的离退休政治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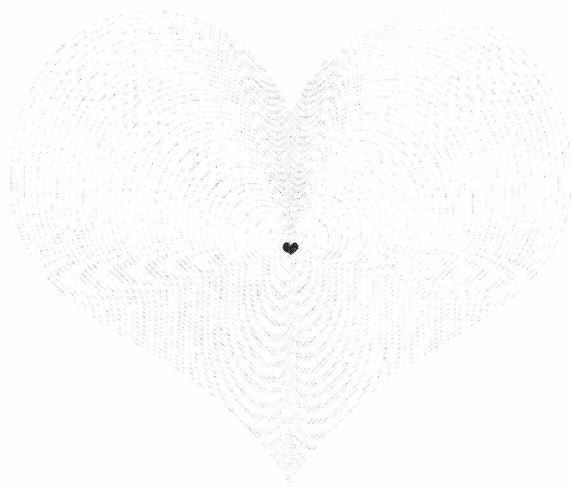
今天，我们将其汇集成册，希望能够给社会以启示。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

《公益时报》社社长

刘 京

2011年5月



目 录



2001—2004 年

中华慈善总会会长阎明复谈慈善	(1)
霞光满天——访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	(7)
崔乃夫纵谈中国公益之路	(14)
崔乃夫：财富上面能长出精神吗	(22)

2005 年

董建华：首任香港特首的公益情结	(27)
钱其琛：外交家的公益情怀	(31)
崔乃夫：自治是中国公益慈善之本	(33)

2006 年

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我的工作是向富人伸手要钱	(37)
吴桂贤：走下政坛 步入公益	(43)
社会工作和谐社会制度性安排	(46)

“性情部长”高占祥：为给孩子募捐磨破嘴皮去化缘 (50)

“社会工作”是建设和谐社会根本

——专访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常务副会长杨建昌 (55)

2007 年

董建华：从特首到理事长 (59)

2008 年

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的“退休三部曲” (63)

“便当部长”张保庆 2 年筹集 8 亿元善款 (69)

新加坡开国元勋李炯才的中国情结 (73)

伍绍祖：10 年一觉奥运梦 (78)

龙永图：慈善可使博鳌论坛起死回生 (89)

2009 年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理事长赵炳礼：在公益组织中突围 (93)

李瑞环助学 10 年背后的故事 (98)

2010 年

蒋正华寄语《公益时报》：公益观念普及需要多元化 (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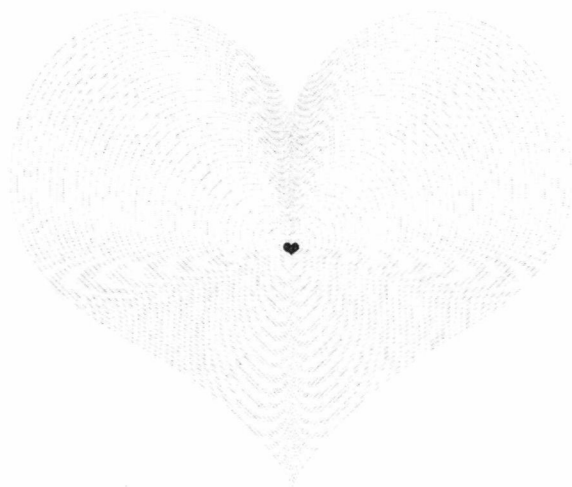
成思危：中国慈善最需培养全民意识 (108)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转型尝试 (112)

徐瑞新：抓住机遇 创新机制 构建现代社会工作的大格局 (116)

2011 年

顾秀莲：专业人才是慈善机构最迫切的需求 (121)



2001—2004 年



中华慈善总会会长阎明复谈慈善

拨通了中华慈善总会副秘书长的电话，我们报纸，《公益时报》想采访阎明复。从1997年秋天起，阎明复担任会长。人们还是习惯叫他部长，而且他的记忆力过人。他记得住许多人的名字。在一次谈话中，他说过：他崇敬周恩来总理。

我直接拨通了他的电话，他让记者当日晚些时候过去。

这是记者第一次以工作的名义采访他，在他设在北京二龙路街的中华慈善总会的办公室。阎明复一见面就干脆地说：有人说我是中华慈善总会的独

裁者。与当年相比，那个儒雅的，曾经当过中央领导人的俄文翻译早已从一个书生变成了一个在中华慈善事业里呼风唤雨的人物。

在不同的场合，阎明复会动情掉泪。也许，作为一个政治家，眼泪会带来错误。但是作为一个慈善家，眼泪确是他珍贵的真情实感。那种个人的亲和力，更是慈善的一种无形资产。罗斯福曾经说过，即使我力拔山，气盖世，如果没有慈心一片，又算得什么？

社会主义要不要搞慈善

中华慈善总会建于1994年，是民政部体制改革的产物。当时崔乃夫老部长和我在思索，扶贫、救灾、特别对困难群体的帮助，仅靠政府是不够的。政府应该是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的，但是承担了许多社会职能。政府面对的应是普遍的对象，个别的怎么办？市场经济以后，出现了向钱看的倾向，怎样用慈善发扬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我们酝酿应该成立一个民间机构，当时有人提议叫“中国福利慈善总会”。崔部长认为，福利与慈善是两个概念，福利是政府行为，慈善是民间的活动。中华的范围比中国大，包括了世界各地的华人。崔部长正名为“中华慈善总会”，境界马上提高了。

慈善总会成立步履艰难。当时有争论，社会主义要不要搞慈善。慈善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被批判的。崔乃夫组织学者讨论，开了许多研讨会。特别是结合十三大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讨论，许多著名学者加入讨论，甚至还有文艺界的人士，我记得王蒙也参加了。大家对慈善持肯定态度。当时我们在天津有一个刊物，叫“慈善”。这个刊物的名字也受到了质疑，有人认为应该叫“公益”。瑞环同志讲话后，“慈善”才得到批准。后来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李瑞环主席给题了词。朱镕基总理说不题词了，但是支持。我们请每个部推荐最好的企业捐款，每个部都推荐支持。

在实践中中华慈善总会怎样？1998年给了我们一个机遇，坏事变好事。1月10日上午张北地震，当日晚上发出呼吁，11日、12日募捐，13日派出12辆卡车，把棉被、方便面、钱款送到灾区。

1998年夏天空前的洪水灾害，出现了空前的搏斗，慈善事业空前大发展。

我们向总会的团体会员发出呼吁。广州分会一马当先响应，捐出 1000 万元。接着，总会向全社会紧急呼吁，发起紧急救助日。我们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大型义演，当场收到了 6 亿多元的捐款。整个救灾期间募集了 6.4 亿元，其中 3 亿多元人民币，其余是物资。我们还与全国工商联一起发出呼吁，工商联会员捐了八九亿元。我们和中国企业家协会联合呼吁，他们的会员、国有企业捐了 8 个多亿元。后来零点调查公司评价：总会抗灾前知名度是 3%。就灾后达到 30%。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老百姓找到了民间机构来体现爱心。

不久，民政部党组听取了总会的回报，国务委员司马义·艾买提也参加了。会上充分肯定了这一段总会的工作，并明确把部分职能委托给了中华慈善总会。总的任务是社会救助，都是围绕对各方面的困难群体进行社会救助。

中华慈善总会在做什么

当前慈善总会已经进行和正在进行的项目有：

小区扶贫：这个项目是联合项目，和香港世界宣明会联合办的，如在广西、云南、贵州、宁夏、青海等搞小区扶贫。这些项目将彻底改变受援农村的面貌。一个项目上千万元，过程要五六年。

微笑列车：是目前最大的项目，开始于 1999 年 1 月。美籍华人王嘉廉的冠群电脑公司捐助两千万美元，给中国的贫困家庭唇腭裂患者进行手术治疗。

烛光工程：是帮助西部的贫困教师的项目。那里教师工资很低。在困难地区，教师还不能及时拿到工资。张艺谋的《一个也不能少》形象地描写了这个情况，他把电影首发式的钱捐给了烛光工程。这个项目得到了教育部的大力支持。总会烛光工程同全国自考办共同发起“烛光自考工程”，要在八年之内，募捐 1000 万元。帮助 10000 名西部地区农村老师通过自学考试取得大专师范文凭。

救灾救助：今年初，内蒙古、新疆发生严重雪灾、沙暴。我们向全国 110 个团体会员发出呼吁，向香港、台湾的慈善团体发出通报。到目前我们募集到将近 1300 万元善款和价值 15 万元的物资。香港的世界明爱会、救世建华

基金会向灾区增了将近 1000 万元的救灾款，大量的救灾物资。台湾佛教慈善基金会近期将派人到内蒙灾区发放大量的粮食。我们要求地方把接受捐助的灾民登记造册，总会先后派出了 8 个工作组把救灾物资直接送到灾区，按登记的名册逐户发放，效果很好。

特殊儿童救助：陕西司法厅的张淑琴，在陕西办了 3 个儿童村，帮助在监狱服刑的犯人的孩子。到北京后，在慈善总会的帮助下，成立了特殊儿童救助部，在顺义办了儿童村，收了将近 40 个孩子。总之，目前 34 个项目同时进行。

国内外捐款比例与善款管理

这几年，总会募捐情况大致是，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捐款多一些，如 1998 年总会募捐到将近 7 个亿的款物，今年头三个月境内外募集到 4000 多万元款物。一般情况下，每年大约 2000 万元—4000 万元的款物。这里不包括总会的合作伙伴在各地直接实施各种项目的经费（这些不经过总会的账目）。

从捐款的情况来看，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国内各大金融机构，大公司大企业捐款较多，而且数额大。普通百姓援款捐物，通常是小额募捐，充分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

善款是有限的，目前国内从事各种募捐活动的机构很多，但怎样募捐善款，取决于团体的管理，特别是财务管理。

我们的日常行政经费每年约 50 万元—200 万元，主要是创始基金（约 3000 万元）的利息和各界的专项捐款（用于行政开支的）。

总会严格的财务管理，有严格的监督制度。取信于社会，才能生存。我们注重财务管理，强调透明度。我们的口号是：救灾到人，扶贫到户。

有严格的管理，除了国家审计署和国际大审计公司——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外，最近我们请民政部信息中心帮助我们设计，搞了一套电脑管理系统。任何大的项目，都可以从网上调出来，条目公开，任何人都可能监督。老百姓捐来的款，对老百姓有一个交代。

总会与政府的关系

慈善总会与政府机构不同。慈善总会是社会团体。社会团体工作要在观念、作风上有彻底的转变。不仅杜绝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的现象，而且一个实质的问题是，经费的来源改变了，不是财政批款，而是向社会募捐。所以总会的工作人员要在观念上、作风上逐步转变。

中央正在推行“小政府、大社会”的方针。政府机构要转变职能，要明确哪一些属于政府职能，哪一些职能交给社团。政府机构要放权。现在，许多社会职能还是政府机构行使。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对于福利院，民政系统仍管理许多。政府部门应进行监督、招标、资金支持，把福利院委托给社会团体来管理。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政府机构不愿意交，也有的地方，是没有适当的团体能够接管。当然，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有过渡时期。

关于立法方面，已经有了公益事业募捐法。在今年三月全国人大通过的第十个五年计划中提出了“支持慈善事业的发展，加强对善款使用的监督”，这非常重要。最近国务院下达的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若干意见》中，规定对慈善、公益机构的救济，用于目的的捐款，可在税前全额扣除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局、海关总署发布的《扶贫慈善性捐款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都是对慈善事业的大力支持，为我们的扶贫工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政策保障。对此，一定要严格审批，哪些公益机构可以减免税，否则会造成税收流失。一定要有严格监督，对违反法律的机构要取消减免税的资格，要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总会要更加加强自身管理，切实做到“救灾到人，扶贫到户”，不辜负中央的期望，老百姓的信任。

关于慈善总会的社团性质

中国要小政府，大社会。民政部贯彻这个方针，成立了社团。但是我们明白，慈善总会是官方版的群众团体。官办的社会团体是中国的特色，是改革的产物。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立法的进一步完善，管理的加强，民办的

社会团体将会增多。

目前，在中国，纯民间的团体是很少的。从美国的民间社团看，它们也在执行政府的委托，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团的独立，是项目决策和执行独立。美国每年捐款 7000 亿美元（美国的慈善募捐动员广泛，每个家庭平均每年捐 1000 多美元），几乎国民收入的 1/10 用于公益，有 90 多万慈善机构。在 7000 亿美元中，3000 多亿美元是民政部门和非政府组织（NGO）签的合同。政府税务部门对此有严格的监督。实际上，把政府在做的事交出，把执行者变成委托者，减少了机构，或不需设机构，只实行监督。总会根据民政部的委托，执行部里委托的部分职能，如救灾扶贫，在经费方面也应得到政府的支持。

原载于 2001 年 6 月 1 日《公益时报》

阎明复 民政部原副部长、中华慈善总会会长，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霞光满天

——访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

高占祥说“山里孩子苦啊！坐江山不能忘了老区，中国最缺的就是人才”。凭着“四大名嘴”之一的功底和以后工作长期的坚韧和执着，从广州回来他解决了100个老区娃娃的救助问题，这是中国文联第二期“朝霞工程”打响的第一炮。他自己总结说，搞“朝霞工程”是靠真情打动人家，靠自己的人格魅力。

凡采访过他的记者都认为：采访高占祥是一件愉快和幸运的事情！他风趣、幽默、多才多艺。和你聊书法、聊摄影、诗歌、写作、变魔术、唱京剧乃至为官、修身之道。他的家中，除了书还是书。书房是书房，客厅也是书房。正所谓：风云三尺剑，花鸟一床书。

他喜欢微笑。他在诗集《微笑》中写道：微笑像霏霏春雨，能唤醒沉睡的大地；微笑像弯弯的月亮，能使黑夜的苍穹更有诗意；微笑像汪洋中小船的风帆，能给水手的前程带来美好的希冀……

这是一个充满爱心和激情的人；一个对生活宽容、充满好奇心、好胜心但绝对爱憎分明铁骨铮铮的人。剑胆琴心、侠骨柔肠、重信重义的朋友，一个老百姓的好官。

“三霞工程”代表人生的三个历程

记者：文化扶贫进行了很多年，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您发起了“三霞工程”。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高占祥：文化扶贫重要的是智力扶贫，开发扶贫是开发致富的出路。有了文化穷不久，没有文化富不长。“三霞工程”受到好评是因为它本身代表了人生的三个历程，是人生共同的真善美，人类时间的三部曲，有了鲜艳的朝霞、灿烂的彩霞、壮丽的晚霞才是人类完美的命运。

首先发起的是晚霞工程。到文联后，我发现有一大批文化文艺界大家，手里头积存大量手稿，出不了书，如音乐大家李焕之。艺术名家创造的财富、积淀的文化是一大笔财富。过去有些做的太晚了。昆曲大家余振飞的夫人李强华一次说：振飞想把作品和表演的戏剧艺术抢救一下。我问他年岁多大，她说：我今年58岁，我的年龄倒过来就是他的年龄。余振飞是演小生的，抢救非常困难。先抢救了12出戏，后来又抢救了18出，拍出后我专程到上海祝贺。抢救出书的白杨抢救了一批资料刚印出来，她写了一首诗准备在晚霞工程汇报晚会上朗诵，谁知没来得及就去世了。“十老音乐会”刚完，音乐家贺绿汀就已不在了。

晚霞工程发起之后，大批的老艺术家对晚霞工程鼓掌叫好。陈强甚至喊出了：晚霞工程万岁！管桦说，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下一步我们准备给昆曲大家录像，举办活动。

后来中青年艺术家又讲：中青年是最有光彩的，不要耗老了再抢救。这才搞起了彩霞工程，把李光、刘长瑜一批青年的艺术成就录了下来。

记者：“朝霞工程”的发起是因为您做过青少年工作吗？

高占祥：我一直认为文艺人才的造就要从少年抓起，20世纪80年代我在文化部的时候就开始酝酿。我写过两篇文章叫《论少年文艺》、《论文化大厦之基》。我一直是做团的工作起家的，从工厂团支书一直到团中央书记，一步步当遍了。做团的工作使我重视少年艺术人才的培养，就有了朝霞工程。

前年，香港的张天爱女士看到我这么多年拍摄的花卉很高兴，建议我拿着画册找企业募捐，捐来的钱给孩子。我说，一定要把孩子印上。就给文联基金会的同志讲：选择好对象，鼓打在点上。希望工程救助贫困孩子，朝霞工程救助有艺术天赋的孩子。

天津的胡晓楠到台湾演出，自打自唱很精彩，台湾观众认为是京剧神童，非常轰动。后来我收到台湾刘先生的一封信说：我们都知道你爱才，也知道

您对京剧事业特关心。但不能理解的是我们认为是京剧神童的胡晓楠回到学校后，却因支付不起学费让他退学……接信后我首先是怀疑，让秘书打电话问是不是真有其事。学校说，是有这么回事。我就讲：对尖子人才，不能照顾一下吗？学校说：都是尖子，照顾不过来。原来，胡的父母都下岗了，他跟着姑姑，后来姑姑也下岗了，接着父亲病死。我让秘书把我的稿费3000元寄去。我写了40多本书，有一些稿费。学校有意见认为我应该寄给学校，我很生气：我自己的稿费寄给谁我决定。春节，他母亲带着孩子来拜年，我又给了他1000元算是压岁钱。

为“朝霞工程”的孩子们化缘

记者：“朝霞工程”是如何运作的？

高占祥：朝霞工程的第一批放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前年准备，前年运作，当时西部大开发还没有做宣传。主要是三个考虑：培养民族文艺人才，江总书记在听我汇报中国京剧现状与发展前景时有一个讲话：注意培养造就21世纪民族文艺人才，培养民族文艺人才。中央文化扶贫也是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西部大开发，早在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上已经知道，虽然西部文化扶贫没提出，但构想方向已清楚。

去年朝霞工程救助2000个孩子，可费了劲了。靠的是三皮精神：磨破嘴皮、硬着头皮、厚着脸皮。文联文联，一没钱二没权，全靠嘴巴搞宣传。到哪去募捐都得给人家做一些服务，从晚霞到朝霞题词写字1100多幅，平均每天3—5幅，到意大利中华商会的当天晚上，当场题字50多幅，腰都直不起来了。2000多幅照片其实都是百里挑一，搞摄影的都知道，一卷里有一两张好的就不错了。为这三大工程我花了5万多块钱，赠书8000多册，通县图书馆送4000册，深圳大学600多册。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四书：买书、读书、写字、赠书。

记者：这和您童年的经历有没有关系？

高占祥：小时候家贫，房没一间，地没一垅，整天挨饿、挖野菜。走投无路到石景山钢铁厂（现首钢）做童工。当时受日本统治，9岁时，编了一